

# 2016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综述

贾中正<sup>①</sup>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2016年国内外学术期刊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文献，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概况、劳动价值论与国际价值以及国际贸易的关系、中特理论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新思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良好实践等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和回顾，这将为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和解决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 劳动价值论 中特理论 一带一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是发展着的开放的经济学体系。它被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并指导我国革命、改革、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杨承训，2016）<sup>②</sup>。将其作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亦在经历快速发展和创新。为了更好地了解2016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状，本文分别从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上选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部分代表性文献，对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以期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概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 一、引言

2016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回暖但基础仍不稳固，反全球化趋势、美国政策调整、英国脱欧进程、地缘政治冲突、资产价格泡沫、全球债务水平过高等问题突出，面对这些现实挑战和难题，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和研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2016年刊发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文献，分别从《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当代亚太》、《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理论动态》、《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欧洲研究》、《金融评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中文期刊，以及 *Science & Society*、*New Political Econom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Monthly Review* 等英文期刊选取58篇文章（见表1），并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和回顾。本文对相关文献的选取标准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集研究，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归类 and 总结，以期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和解决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现实问题。

表1 2016年期刊发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章的分布情况表 单位：篇

类别	中	经	世	世	当	国	国	当	金	中	欧	经济	青	财	马	Sci	Revi	New	Mon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sup>①</sup>贾中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邮箱：jjazz@cass.org.cn。

<sup>②</sup>杨承训（201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地位不容撼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

	国 社 会 科 学	经 济 研 究	世 界 经 济	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	代 亚 太	际 经 济 评 论	外 理 论 动 态	代 世 界 与 社 会 主 义	融 评 论	国 工 业 经 济	洲 研 究	学 (季 刊)	海 社 会 科 学	贸 经 济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enc & Soc iet y	ew of Radi cal Poli tica l Econ omic s	Poli tica l Econ omy	thl y Rev iew	计
马克思主义 国际政治经 济学		1							1		1		1		4					8
劳动价值论		1	5					1		1					1	1	2	1		13
中国特色	3	3													5	1				12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1	4						1						1	4					11
一带一路				4	1	1	2					1			1	2		1	1	14
合计	4	9	5	4	1	1	2	2	1	1	1	1	1	1	15	4	2	2	1	58

从2016年主要期刊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发表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以15篇的数量拔得头筹,约占刊发总数的26%;其次为《经济研究》,刊发了9篇,约占总数的16%;《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Science & Society*等刊发数量位于4-5篇之间。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适当向相关研究文献倾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较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从2016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的分布情况来看,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良好实践的文献最多,为14篇;其次分别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础之一(13篇)、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泉(12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11篇)、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概况(8篇)。随着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的文献所占比重明显增大,这不仅丰富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学术内涵,而且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进和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持。

##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前提是解决认识问题: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社会经济规律的科学,而非简单的“政治”加“经济学”,其学科建设需要融合,而非对立(白永秀、吴丰华、王泽润,2016)<sup>①</sup>。在经济全球化的演化中,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拓展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并存的研究上。从20世纪60年代的“依附论”到80年代的“世界体系论”,再到当今的“全球化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关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张雷声,2016)<sup>②</sup>。正确判断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既是一个国家

<sup>①</sup>白永秀、吴丰华、王泽润(2016):“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

<sup>②</sup>张雷声(2016):“经济全球化视阈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

制定对内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又是形成国际秩序观的重要基础，不同的秩序观反过来又会促进或者阻碍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从深层次揭示了国际秩序变革和发展的动力，以此逻辑研究可知，正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了国际秩序的不合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批判中要重建文化自觉，探索出超越现存的西方中心观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秩序（刘海霞，2016）<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既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从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它的基本范畴包括国际劳动、国际分工、国际价值、世界市场、世界货币、世界经济危机、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这八个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到未来社会发展构想，勾画出较为完整的世界体系发展脉络。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应研究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性和两极分化，研究国际金融领域的投机性和掠夺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国际问题，有助于对世界宏观运行、整体结构、内部关联和发展趋势给予科学而全面的回答（欧阳向英，2016）<sup>②</sup>。

与西方国家对国际贸易与收支分析忽略商品的具体生产过程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强调生产和生产的国际关系。与西方对国际收支“交易汇总表”分析的工具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强调国际收支的性质和变化原因的过程论。与西方（特别是IMF）国际收支调节货币论和结构论的总需求分析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收支分析更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分析（林楠，2016）<sup>③</sup>。对中国而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规律的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处在艰苦探索和努力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因而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而且创造着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在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在于考察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分析如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阶段的根本目的在于阐释如何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刘伟，2016）<sup>④</sup>。基于此，我们应通过创新政治经济学学术研究，高标准建设政治经济学队伍，打造政治经济学的阵地和平台，提升人才培养水平等措施，以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建设（白永秀、吴丰华、王泽润，2016）<sup>⑤</sup>。

### 三、劳动价值论、国际价值与国际贸易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和学术扩展性，从其逻辑基点上可以延伸出对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制度及政策选择的科学思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经济分析的逻辑基础，是可运用于或启发我们观察和研究现实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学术源泉，更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点，也是在发现新现象中展望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启示（金碚，2016）<sup>⑥</sup>。马克思有关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包括了劳动过程、劳动力“贫困积累”的再生产和劳动价值创造与分配三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张平、郭冠清，2016）<sup>⑦</sup>。能否用劳动价值论来合理地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在学界存在争议。大卫·李嘉图认为，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国内贸易而不适用于国际贸易，“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互相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逐渐走向完全否定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的道路。他们先是用交换价值的概念来偷换价值的概念，然后又用价格来取代交换价值，最后再用商品的供求关系来说明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例如，约翰·穆勒提出了所谓的“国

<sup>①</sup>刘海霞（2016）：“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国际秩序的重构——再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路径”，《欧洲研究》，第2期。

<sup>②</sup>欧阳向英（2016）：“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基础性问题”，《青海社会科学》，第5期。

<sup>③</sup>林楠（201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收支分析：文献综述”，《金融评论》，第3期。

<sup>④</sup>刘伟（2016）：“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第5期。

<sup>⑤</sup>白永秀、吴丰华、王泽润（2016）：“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

<sup>⑥</sup>金碚（2016）：“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及理论启示”，《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sup>⑦</sup>张平、郭冠清（2016）：“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及劳动价值创造与分享——理论、证据与政策”，《经济研究》，第8期。

际价值法则”，即一国的生产物总是按照该国的全部输出品适足抵偿该国的全部输入品所必需的价值，与其他国家的生产物相交换。而且，其认为“价值一词在没有附加语的情况下使用时，在政治经济学上，通常是指交换价值”。与李嘉图和穆勒等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解释国内贸易，而且也适用于解释国际贸易，因为“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李嘉图的错误在于他用实际消耗的劳动量而非社会必要劳动量来确定商品的价值量。

自从李嘉图提出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国际贸易的观点以来，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走向了放弃劳动价值论而完全依靠供求关系来解释国际贸易的道路。另一方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围绕劳动力在国际间是否充分自由流动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派别。一派根据不存在劳动力的国际自由流动而断言不会形成国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否定了国际价值的存在；另一派则认为是否存在劳动力的国际自由流动并不是国际价值存在的必要条件（冯金华，2016）。然而，根据劳动价值论、等价交换和“一价律”的假定可证，任意一个国家生产的任意一种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等于这个国家中该商品的价格与所有商品的价格总量的比率乘以生产这些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总量（冯金华，2016）<sup>①</sup>。任意一种商品的单位国际价值等于用任意一个国家的货币来计量的该商品的价格与全世界所有商品的价格总量的比率乘以全世界的劳动总量。由此说明，任意一个国家在其单位国别价值比率相对小的商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任意两个国家的任意两种商品的国际交换比率等于这两种商品的单位国际价值的比率，且任意两个国家的汇率等于这两个国家的货币所代表的单位国际价值的比率。此外，还有学者（严金强、马艳、蔡民强，2016）<sup>②</sup>认为，现有关于转形问题的研究过多集中在转形结果，特别是“总计一致二命题”的分析，忽视了对转形过程的动态分析。将转形结果的“总计一致二命题”作为判断马克思价值和生产价格理论成立的依据，忽视了转形真正的不变性方程在于活劳动创造的价值（或生产价格）总量不变。原因在于忽视了促使价值转为生产价格的动态化作用机理，以及体现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第三个不变性方程”。

平均利润理论是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展而来，可以说，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对一般利润率的估算应该立足于两大部类的视角，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有效识别，不仅需要立足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而且需要充分考虑各国之间的空间异质性与空间相关性，更需要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层面对其进行考察。为此，Diaz and Velasco (2016)<sup>③</sup>从马克思两部门扩大再生产计划的角度分析了一般利润率和随后生产价格的形成，其研究发现，通过将原始变换过程纳入累积方案所提供的时间均衡框架，可以得到变换问题的一致解。对简单再生产的特殊情形的前解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所有这些解决办法都依赖于固定工资率的限制性假设。Duméniland Lévy (2016)<sup>④</sup>认为，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必须以对公司资本存量的增加为代价，而这大大削弱了创新的盈利能力。徐春华（2016）<sup>⑤</sup>从两大部类的视角估算了1995-2009年38个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进而考察一般利润率的国别差异、下降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其发现各国经济体中两大部类的利润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并且第II部类中的利润率整体上高于第I部类。从总体均值层面看，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的趋势会导致其中的利润率水平下降得比消费资料部门更为明显和稳健。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在所有样本国家整体均值层面显著存在。检验结果表明，考虑空间关联后，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对一般利润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二重性。据此得到的对中国的启示是，虽然整体上中国较低的一般利润率可能导致国际资本抽离，但其一般利润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在长期内会吸引外资留在中国。另有学者认为，在利润率动态的研究中以再生产均衡为预设前提的做法是片面的。利润率的变化

<sup>①</sup>冯金华（2016）：“国别价值、国际价值和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第10期。

<sup>②</sup>严金强、马艳、蔡民强（2016）：“动态价值转形理论：模型与模拟演示”，《世界经济》，第12期。

<sup>③</sup>Diaz, E. & Velasco, F. (2016).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s into Prices of Production in Marx's Scheme of Expanded Reproduc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8(3), 394-416.

<sup>④</sup>Duménil, G. & Lévy, D. (2016). Technology and Distribution in Managerial Capitalism: The Chain of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à la Marx and Countertendential Traverses. *Science & Society*, 80(4), 530-549.

<sup>⑤</sup>徐春华（2016）：“危机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表现、国别差异和影响因素”，《世界经济》，第5期。

只有置于一个以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为基础的非均衡框架中,才能得到全面的分析。孟捷和冯金华(2016)<sup>①</sup>从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再生产失衡的立场出发构建了一个新的解释平均利润率变动的模型。据此发现,平均利润率变化是由技术进步、实际工资和产品实现率这三个因素决定的。还有学者从国际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视角对长期均衡利润进行了研究。伴随全球经济重构过程中服务业和廉价制造业的增长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球蔓延(宋建丽,2016)<sup>②</sup>,建立在妇女受薪劳动以及女性贫困化基础上的全球资本主义新的积累体制正在形成。Stockhammer(2016)<sup>③</sup>以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及其需求类型理论为基础,阐述了欧元危机。其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并没有引发持续的以利润为导向的增长过程,而推动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金融泡沫和家庭债务上升(债务驱动型增长)或净出口(出口驱动型增长),旨在限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的经济政策架构反而放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冯志轩(2016)<sup>④</sup>通过扩展Morishima-Ochoa方法,利用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了世界市场上的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得出国际生产价格是世界市场价格主要调节者的结论。与以往有关经验研究的结论不同,其发现价值和生产价格对市场价格解释力相近的结论可能是不成立的,并对调节资本长期均衡利润率进行了测算,证实世界上存在利润平均化趋势,从而支持了世界市场上国际生产价格主导市场价格的结论。同时,其还发现国际利润平均化主要发生在行业之间而非国家和地区之间,这为不平等交换理论提供了支持。

吴阳松(2016)<sup>⑤</sup>认为,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在巨大的多样性和深刻的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环境不公正盛行,促进经济发展的机构与生态学家以及民权社会之间的冲突蔓延(Barkin& Lemus, 2016)<sup>⑥</sup>。作为“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其建设所遵循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破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带给中国的启示主要有(张平、郭冠清,2016):首先,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是“人力价值”提升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现实提出的基本劳动命题。其次,在劳动力循环过程中,消费作为劳动力再循环过程的起点包含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即提高劳动者素质,如幸福感等)的性质,因此消费已并非满足一般物质消费的简单再生产。消费作为经济循环过程的起点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关键,是未来效率和社会福利提升的决定性因素。最后,对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和创新劳动的重新认识以及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分配权利的变化,有助于对中国“十三五”中创新、共享和橄榄型社会等目标进行理论上的阐释。

#### 四、中特理论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新思路

纵观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马克思对人类思想作出了两个最伟大的贡献,一方面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唯物史观,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发现了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王伟光,2016)<sup>⑦</sup>。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坚实基础,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要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深化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发

<sup>①</sup>孟捷、冯金华(2016):“非均衡与平均利润率的变化: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世界经济》,第6期。

<sup>②</sup>宋建丽(2016):“全球资本主义与劳动分工:历史唯物主义的性别维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

<sup>③</sup>Stockhammer, E. (2016). Neoliberal growth models, monetary union and the Euro crisis. A post-Keynesian perspective. *New Political Economy*, 21(4), 365-379.

<sup>④</sup>冯志轩(2016):“国际价值、国际生产价格和利润平均化:一个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第8期。

<sup>⑤</sup>吴阳松(2016):“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实践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第3期。

<sup>⑥</sup>Barkin, D. & Lemus, B. (2016). Third World Alternatives for Building Post-capitalist World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8(4), 569-576.

<sup>⑦</sup>王伟光(2016):“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

展趋势的认识和把握,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和对当代世界发​​展格局及其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把握,提高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回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阶段、新情况、新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修课”、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思想,体现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升华,也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更为宽广视域的研究和运用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特色的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新性的和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成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术范式的标识(顾海良,2016)<sup>①</sup>。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真理,是工人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指南。它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工作和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王伟光,2016)<sup>②</sup>。

具体来看,“四个全面”的提出即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良好体现。“全面小康”的提出表明了党中央努力规避市场经济的弊端,使其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全面改革”的深化揭示了党中央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进一步理顺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前提条件。“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显示了党中央对法律规范在经济乃至社会生活中的科学定位。“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施宣示了党中央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和锻造坚强领导核心的勇气和魄力(范林志友,2016)<sup>③</sup>。“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光辉典范。从五大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联系来看,科学发展观是五大发​​展理念最为直接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五大发​​展理念又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续深化和发​​展。二者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理论与政治定位有所不同。但必须强调的是,五大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并不是相互冲突的排他性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包容性关系(蒋红群,2016)<sup>④</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对中国历史进行政治经济学解读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忽略对历史潮流与世界格局的研究,只能导致中国经济研究的低层次与碎片化。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拓宽历史视野,从世界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演变的多样性、大格局中去研究,更要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去研究和建设(武力、肖翔,2016)<sup>⑤</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其民族性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特殊性;二是决定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基本国情基本实践的特殊性。其世界性也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中,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具有世界范围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与别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相互学习和借鉴。无论是民族性还是世界性,关键在于创新(逢锦聚,2016)<sup>⑥</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立足我国国情和现实,吸取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能认真吸取别国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实践经验,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并为世界经济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揭示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进而引导经济学研究和

①顾海良(2016):“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经济研究》,第1期。

②王伟光(201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经济研究》,第3期。

③林志友(2016):“市场经济的演进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

④蒋红群(2016):“五大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之关系探要”,《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0期。

⑤武力、肖翔(2016):“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维度思考——从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7期。

⑥逢锦聚(20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经济研究》,第10期。



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理论工作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客观上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丰子义,2016)<sup>①</sup>。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有三个“不仅仅”:不仅仅是对交换价值及交换关系的批判,而且是对包含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内的商品关系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统一性的批判,而且是对剩余价值及剥削关系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作为结果的剩余价值的批判,而且是对产生这种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与此相对应的是,不能把资本关系及作为其最基本形式的商品关系仅仅作为经验事实来看待,而是应当把它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待。不能仅仅把它当作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来看待,而是应当把它当作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即基于内在发生学过程的历史事实来看待。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般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而是更应该把它当作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即基于客观内在矛盾运动过程的历史事实来看待(唐正东,2016)<sup>②</sup>。Palermo(2016)<sup>③</sup>认为,马克思论述了竞争的阶级性,并解释了社会压迫和个人自由在资本主义中共存的原因。具体而言,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批判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的分配正义在经济、权利、道德、未来等4个层面陷入正义的幻象(陈飞,2016)<sup>④</sup>。从经济层面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对工人阶级极其不公,工人阶级遭受严重剥削。从权利层面看,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分配在法律或形式上是正义的,但事实上工人并没有能力享有权利,陷入实质上的非正义。从道德层面看,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违背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因而是非正义的。从未来层面看,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双倍的非正义,它同时违背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两个正义原则。

总之,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其首要理论思想来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创新。它既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与时俱进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又需要系统准确地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卫兴华,2016)<sup>⑤</sup>。目前,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要努力增加合理有效的投资,更好地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全面激发制造业投资活力,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质量和效益。准确把握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对于实现上述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在依法治国的视阈下,中国市场经济既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中国市场经济的个性,即中国市场经济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华清君、刘诚,2016)<sup>⑥</sup>。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来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生产社会化发展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体制从“自发”到“自觉”演变规律的内在要求,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刘凤义、崔学东、张彤玉,2016)<sup>⑦</sup>。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制度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它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或结合。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看,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理论逻辑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既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兼容性,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根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性质以及由此导致的商品性与非商品性并存的二重属性,并表现在产权结构的直接社会性与局部性、计划与市场、等量劳动互换与等价交

<sup>①</sup>丰子义(2016):“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

<sup>②</sup>唐正东(20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层次”,《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

<sup>③</sup>Palermo, G. (2016). Post-Walrasian Economics: A Marxist Critique. *Science & Society*, 80(3), 346-374.

<sup>④</sup>陈飞(2016):“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四重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

<sup>⑤</sup>卫兴华(2016):“澄清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误区”,《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

<sup>⑥</sup>华清君、刘诚(2016):“论依法治国视阈下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价值向度”,《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第2期。

<sup>⑦</sup>刘凤义、崔学东、张彤玉(2016):“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客观规律——兼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学习体会”,《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

换、劳动力的主人地位与商品属性、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等具体方面。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体现公有制的要求；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实质，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深刻把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地体现和发挥公有制经济的特点和优势，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更好结合，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张宇，2016）<sup>①</sup>。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围绕这种结合所进行的理论分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思想基因的理论化，是我们辨识“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坐标或参照系的底色，但对其中的思想基因还存在一个理论化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最终表现为在重大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是国家的意志支配着资本，还是资本的意志支配着国家的问题（杨春学，2016）<sup>②</sup>。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国家摆脱资本意志的不良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但还需要在综合考虑这种制度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最适度的所有制结构问题。在中国语境中，只有在中央与地方的政府结构中，并且充分考虑到官商关系，才能更有效地讨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展现出经济治理结构的特性和面临的问题。

马克思的市场学说可以按顺序归结为5个方面，分别是：市场的本质——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市场；市场的特征——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现象形态的市场；市场的结构——作为反映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规模、结构和布局的市场；市场的职能——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市场学说史——对前人市场学说的评价（宋则，2016）<sup>③</sup>。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重大理论突破，其精髓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可以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发挥二者的优势，并生成新的制度、体制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凝练出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市场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一些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实践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化和系统化（胡家勇，2016）<sup>④</sup>。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企业具有双重生产目的。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其直接的生产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公有剩余价值（程恩富，2016）<sup>⑤</sup>。而公益性公有企业的直接生产目的，是以使用价值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含生态环境的需要）。但所有公有制企业的最终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并服从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全体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所进行的宏观调控，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最终是为生产使用价值服务的，因而体现了人民主体性和民生导向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为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社会分工和多种不同的所有制。在此条件下，即使在公有制经济内部，不同的企业或者经济单位的产出和资源利用效率不一样，为了鼓励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必须允许企业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社会不能无偿占用或者调拨企业的产出，企业之间也必须实行等价交换，否则会挫伤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资源的低效利用甚至浪费。公有制企业的生产和交换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公有制经济也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的基本原理（简新华、余江，2016）<sup>⑥</sup>，并不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高度成熟发达的高级阶段、所有制演进到单一公有制的时候，将不再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

<sup>①</sup>张宇（2016）：“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经济研究》，第6期。

<sup>②</sup>杨春学（2016）：“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问题”，《经济研究》，第8期。

<sup>③</sup>宋则（2016）：“马克思市场学说研究”，《财贸经济》，第11期。

<sup>④</sup>胡家勇（2016）：“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经济研究》，第7期。

<sup>⑤</sup>程恩富（201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多样化创新的原则和思路”，《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

<sup>⑥</sup>简新华、余江（2016）：“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吗？——兼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经济研究》，第12期。



济的长远趋势。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徐国松，2016）<sup>①</sup>从时间思想的视角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了分析。其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时间思想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大厦的核心构件，是马克思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标识，是深度系统解读和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绕不开的理论硬核，也是马克思经济学解答时代课题、回应时代挑战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以时间思想为内核的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邃的理论意境，其本体论基础构成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立论之基和理性之根，需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过程中不断得到自我反省。

总之，科学认识西方所谓的市场经济事关中国重大经济政策和决策。市场本身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被供给者、需求者，也是被生产和上层建筑等所决定的。不仅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界消解，难以为中国所借鉴，而且标榜自身为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体也已矛盾重重，同样不可能成为中国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参照（王今朝、张艺、龙斧，2016）<sup>②</sup>。在分析中国经济走势时需求分析和供给分析各有利弊，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理论和有效方法的基础上，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正确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明确供求两侧都存在总量、结构、长短期的问题，不仅是供给侧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需求侧也存在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不能混淆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改革的区别。应对经济下行，必须全面协调配套深化改革、供给与需求两端发力、长短期结合兼顾，才能奏效（简新华、余江，2016）<sup>③</sup>。

## 六、国际金融危机与“一带一路”倡议

不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都带来了诸多新的矛盾、社会冲突和全球对抗。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终结。在后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作为一种社会革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正在获得其现实意义，它是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战略进而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武器（鲍里斯·卡戈尔里茨基，2016）<sup>④</sup>。马克思恩格斯拥有丰富的国际交往思想。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相互促进，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多，依赖日益增强，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大量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国际交往与生产力发展、文化传播、交通运输革命、全球化等的关系（张峰，2016）<sup>⑤</sup>。“一带一路”战略本质就是一种国际交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交往理论对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化、完善并有效地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大国市场开拓的驱动力而言，不同的理论审视市场开拓战略的驱动力有所不同。现实主义者强调大国为寻求安全、相对收益、战略通道而实施市场开拓。建构主义者则宣称对市场的开拓因于理念在推动。马克思认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列宁、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等则强调帝国主义国家实施全球市场开拓战略以寻找原料产地以及为过剩的商品寻找销路。实际上，大国市场开拓有着政治和经济双重维度上的意义。在经济上，大国市场开拓为大规模生产创造了外部条件。在政治上，大国市场开拓既需要政治权力做支撑，又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构成。对于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的执政党来说，政党内部的权力结构决定中央和地方之间经济分权的程度。经济分权实际上是政治精英权力结构变迁所产生的结果（刘明兴、张冬、史宗翰、祝猛昌，2016）<sup>⑥</sup>。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高潮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以致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国内经济社会政策跟不上其步伐，造成就业岗位损失和收入停滞，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成为“输家”，日益强烈地表达不满，政治家则倾向于把问题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

<sup>①</sup>徐国松（2016）：“马克思经济学：时间规划和理论意境”，《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

<sup>②</sup>王今朝、张艺、龙斧（2016）：“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

<sup>③</sup>简新华、余江（201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供求关系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

<sup>④</sup>[俄]鲍里斯·卡戈尔里茨基（2016）：“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黄登学编译，《国外理论动态》，第1期。

<sup>⑤</sup>张峰（2016）：“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交往理论与‘一带一路’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

<sup>⑥</sup>刘明兴、张冬、史宗翰、祝猛昌（2016）：“中国政治精英的权力结构与经济分权的可持续性”，《经济学（季刊）》，第1期。

的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国际主义新形式的推动力量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大相径庭，其对于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至关重要（约翰·施瓦茨曼特尔，2016）<sup>①</sup>。从企业精英层面来看，在发展和获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同时，亚洲仍远超当前全球（即北大西洋）公司精英的网络范围，这是竞争的企业精英崛起的标志，但来自传统核心国家的企业精英仍然是全球企业精英的有力对手（Heemskerk & Takes, 2016）<sup>②</sup>。以美国信贷扩张为代表的应对政策缘木求鱼，未能从供给侧解决生产率滞缓的问题，也未能通过再分配解决全球化收益的分享问题，反而对房地产泡沫推波助澜，导致泡沫的破灭，酿成国际金融危机继而欧洲债务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平庸状态。这场危机远未减弱，而是变得更加明显（Patnaik, 2016）<sup>③</sup>。有证据表明危机中心在发生长期转变，这给理论和经验研究提出巨大挑战（Albuquerque & Callinicos, 2016）<sup>④</sup>。从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及其实现的条件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表明，金融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问题，而非当时的银行业事件。也即，并非雷曼兄弟的失败导致了金融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对实现价值的投资（资本积累）失败而为（Toporowski, 2016）<sup>⑤</sup>。随着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民粹主义化，贸易、投资和移民等领域保护主义政策盛行，全球化趋势有逆转的危险。中国在其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充分利用了上一轮全球化机遇（蔡昉，2016）<sup>⑥</sup>，实现了高速增长和就业扩张，从而使全球化成果得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分享。面对式微的全球化，中国应以其经济体量和潜在消费力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优势，主动有所作为，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推动因素。

近年来，中国启动了“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开拓周边国家市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可以从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4种大国市场开拓模式汲取经验（黄琪轩、李晨阳，2016）<sup>⑦</sup>。作为世界政治中的两个后来者德国与日本，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德国“抢占守成大国的市场开拓模式”是危险的，因为它损害了霸权国英国国内的产业利益，推动英德经济竞争升级到军事竞争。20世纪后半期日本“依赖霸权国家的市场开拓模式”是脆弱的，因为它损害了霸权国美国国内的产业利益，促使美国选择限制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阻断了日本的市场开拓之路。作为世界政治中的两个霸权国英国和美国，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后期英国“倚靠边缘国家的市场开拓模式”是摇摆的，因为面临产业损害的边缘国家逐渐出现强大的产业集团反对英国的市场渗透时，这一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逐步显现。始于19世纪末美国“基于国内开发的市场开拓模式”是稳固的，它让边缘国家国内出现日益依赖美国的产业集团，为美国撬动海外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战略工具和更大的回旋余地。中国的市场开拓需要避免前三类模式的困境，优先开发国内市场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石。

在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大国之间的合作与纷争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一超具有比其他强国优先结盟以及阻止其他强国相互结盟的影响力。从长期来看，在和平的环境中，潜力巨大的强国的成长以及由此引发的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改变将会给现有国际格局带来冲击（宋泓，2016）<sup>⑧</sup>。在这种格局下，中国作为一个相对实力快速提升的新兴强国，中国首先需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做到不冲突、不对抗；其次应与美国共同管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最后要和欧盟以及俄罗斯一道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从现实来看，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虽有竞争乃至对抗的一面，但并非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中国整体实力与美国的差距不会消失。中国将会在现行国际体制内谋求发展而不会另起炉灶。中美应该在不同方面互相调适，以便在和平的状态下建立双边关系的新均衡（薛力，

①[英]约翰·施瓦茨曼特尔（2016）：“反思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宋阳旨译，《国外理论动态》，第11期。

②Heemskerk, E. M. & Takes, F. W. (2016). The Corporate Elite Community Structure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21(1), 90-118.

③Patnaik, P. (2016). Capitalism and Its Current Crisis. *Monthly Review*, 67(8), 1-13.

④Albuquerque, E. D. M. E. & Callinicos, A. (2016). Cris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Marx's Investigations and Contemporary Analysis. *Science & Society*, 80(4), 444-453.

⑤Toporowski, J. (2016). The Crisis of Finance in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Science & Society*, 80(4):515-529.

⑥蔡昉（2016）：“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

⑦黄琪轩、李晨阳（2016）：“大国市场开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式比较及对“一带一路”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

⑧宋泓（2016）：“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当代亚太》，第4期。

2016) ①。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良好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践行全球治理，贡献了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全球治理对中国以及世界发展产生的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张宇燕，2016）②。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蔡昉（2016）认为，根据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理念，以及应对全球经济规则重新调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对策应包括：首先，中国应认识到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中国在清晰认识到全球化倒退可能性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制度优势，不纠缠于一时一事或一城一池的得失，在政策选择和制定中，在方向上保持战略定力，在时机上保持历史耐心，在力度上保持分寸感。其次，利用自身在世界经济中日益提升的地位，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按照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分享权益的原则，调整全球化的方向和规则。再次，推动中国经济内外联动，开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制造有利于各国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经济全球化新增长点。最后，实践新发展理念使参与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地促进创新发展，并通过共享发展使全体中国人民获益。除此之外，还应做到：一是建立两个新的对外开放体制，包括全方位、高水平、高标准的双向对外开放体制和有效的对外开放保护体制。二是重点经营两个对外开放的领域，分别是“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是发展平行体系和发展主导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能力的主要突破口。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对外的金融影响力，是中国获得全球经济规则主导能力的一个重要领域。三是重点使用三个对外开放的平台，分别是G20平台、亚投行等金融合作机制，以及区域与双边贸易投资安排（姚枝仲，2016）③。

## 七、小结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兼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它的基本范畴涵盖了国际劳动、国际分工、国际价值、世界市场、世界货币、世界经济危机、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等，勾画出较为完整的世界体系发展脉络。在经济全球化的演化中，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已逐步拓展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问题等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系和理论架构。综上分析，现归纳总结如下。

从研究结论来看，一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质提量升。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中有关该领域文章数量的增多，一方面，意味着越来越多有关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质量整体上升；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强大活力和朝气。二是研究领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从学术议题分布情况来看，2016年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较多关注于学科自身发展、劳动价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并就交叉学科发展或国际重大问题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三是研究议题更加深入和实用。例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和学术扩展性，从其逻辑基点上可以延伸出对一系列现实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经济制度及政策选择的科学思考，它是启发我们观察和研究当代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现实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学术源泉。此外，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分析和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来看，越来越多的文献采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数学工具、计量模型、数据分析等对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在利润平均化、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研究方面，冯志轩（2016）通过扩展和改进Morishima-Ochoa的研究方法，利用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了世界市场上的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其认为国际生产价格在资本流动没有完全消除国家（地区）之间

①薛力（2016）：“美国再平衡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

②张宇燕（2016）：“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

③姚枝仲（2016）：“以新的开放理念，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

的利润率差距时就能够形成，并得出国际生产价格是世界市场价格主要调节者的结论。

从主要创新来看，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并用其解决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现实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二是将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当代国际现实问题，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多元化。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尚不成熟，这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理论体系仍未完整建立有关，也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偏西方的理论范式有关。从未来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应更多地关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性和两极分化问题，国际金融领域的投机性和掠夺性问题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问题（欧阳向英，2016），这将有助于对世界宏观运行、整体结构、内部关联和发展趋势给予科学而全面的回答，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